

日治時期的基隆顏家：重視文教的礦業家族

陳慈玉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在日治時期的「五大家族」（基隆顏家、板橋林家、霧峰林家、鹿港辜家和高雄陳家）中，相異於其他四大家族皆以大地主身分發跡，顏家的出現於臺灣歷史舞台上，是與臺灣礦業的發展息息相關，主要是金礦與煤礦業。顏家的事業由顏雲年所開創，其弟國年擴展之。他們兩兄弟都擁有雄厚的漢文根基，除了縱橫工商業界外，在當時的詩壇亦負盛名。

一、日治時期的顏家事業

（一）金礦業

顏雲年是以承包人的身分開創其事業的，總督府於1896年9月頒布實施「臺灣礦業規則」，准許一般礦業之開採。但對於金礦，以雞籠山為界，規劃西邊九份礦區為礦一號，東邊金瓜石為礦二號，由「藤田合名會社」（社長藤田傳三郎）取得九份礦一號礦權，田中長兵衛取得金瓜石礦二號礦權。二人皆為日軍征臺時的「御用商人」。

當時治安並不良好，藤田組瑞芳礦山代理所長近江時五郎走訪瑞芳警察署，希望署長永田綱明推薦熟諳日本語而又有能力承包採掘金礦工程的臺灣人，署長乃推薦了該署「巡查補」兼守備隊翻譯的顏雲年。

顏雲年擴展所承包的礦區，1914年以7年30萬圓，分期付款的方式，終於在從事金礦業15年之後，取得管理全權。顏雲年早於1903年即與蘇源泉等人共組雲泉商

本文係2011年11月23日國史館「百年風華——臺灣五大家族特展」系列演講（三）演講稿。

會，繼續發揮以往「調進所」供應物資和勞力的功能，業務逐漸進展，於 20 世紀初期即掌握了當時臺灣三大金山的勞工和必需物品與器材，所以才能累積資本在 1914 年承租藤田組所有金礦。

顏家事業進一步發展是在 1920 年，臺陽礦業株式會社成立，乃成為掌握金、煤兩礦之一大企業，開創臺灣人在殖民地時期經營礦業的新紀元，也是「臺灣五大家族」之一的顏家的一象徵。

1923 年雲年去世後，國年繼續乃兄之遺志，全力開發礦區，並引進新技術，1937 年國年過世，雲年長子欽賢繼任。適逢日本政府頒布產金法以配合急增之軍備，此為獎勵黃金之基本法令。在獎勵產金的政策之下，金之探勘、採掘、搗碎和冶煉等新工程設備均可領取鉅額補助金，臺陽礦業產金量達到顛峰，日本政府於同時期陸續在臺收購黃金高達 70 公噸，臺灣總督因此得到日皇的頒獎。

但隨著瑞芳地區的主脈採掘殆盡，九份的黃金產量開始減少，包工逐漸星散，國際貿易中斷，黃金已非交易手段。1943 年 2 月總督府指示臺灣電力株式會社收購瑞芳礦業所的氰化廠，於是 50 年前的一大金山在戰備政治風雲的籠罩下化為廢墟。

（二）煤礦業

顏家亦經營煤礦的開採事業。1918 年顏雲年與藤田組共同出資 100 萬圓組織臺北

炭礦株式會社，藤田組擁有 60% 的股權，顏氏有 40%，昔日的礦權主與承包商關係終於轉變為合夥關係。

兩年後（1920 年），藤田組無法繼續在臺的事業，遂將所持有的臺北炭礦株式會社的股份，全部讓售顏雲年。雲年和賀田金三郎、木村久太郎及林熊徵協議後，改名臺陽礦業株式會社。顏家另擁有一公司——基隆炭礦株式會社，此公司係顏雲年以其 59 個礦區提供給日本三井財閥而於 1918 年 9 月增資成立的。

兩大資金系統分別成立後，臺陽礦業致力於石底礦廠之開發，決定著手敷設鐵路。平溪鐵路的完成刺激了石底礦廠的開發，1925 年為了統制生產，於是將石底各坑的經營委託基隆炭礦株式會社，其販賣則委託三井物產會社，三井財閥掌握了顏家煤礦的生產與銷售大權。

石底和海山兩煤礦是顏家煤礦業的重心，顏氏之所以致力於改良其生產設備，則是為了適應時代的需要。就日本的殖民政策而言，早期鼓勵臺灣煤礦業的目的是讓臺灣的工業燃料能夠自給自足，中期則使臺煤能外銷華南和東南亞地區，以填補「日本煤業帝國」的空白之處。

日本的礦業政策呼應著其政治軍事情勢，顏國年則配合此政策，奔走各大小礦廠，制定早於 1933 年即已成立的「臺灣炭業組合」（臺灣煤礦業公會）的各基本規則，使其成為名副其實的強化煤礦業統制的

公會，最初成立的主要目的是為使臺灣所有煤礦有計畫的生產，以對付來自島外大資本的撫順煤之競爭，這也是顏氏的卓見。國年去世後，顏欽賢繼續扮演此角色，因受戰爭影響，所以 1937-41 年臺煤生產劇增，顏家企業宛如日正當中。

此組合在 1937 年後日本統制臺灣煤炭的政策中發揮了擴大生產的功能，如能與煤炭商公會合作，則臺煤產銷均在殖民地政府統制之中。就此意義而言，顏國年在日治時期的殖民地政府和民間之間扮演著橋樑的角色。

（三）交通運輸業

除了礦業之外，顏家亦經營交通運輸業，最著名的是基隆輕鐵株式會社，基隆金山本線與觀音町木山間支線的輕便鐵路，瑞芳和金瓜石金礦之間的輕便鐵路，以及修築瑞芳基隆間的汽車道路等，不但有助於九份和金瓜石兩金山的發展，更增進一般民眾行的方便。

二、顏家的橋樑角色

顏家在基隆一帶的名望，是從橋樑角色逐步建立起來的。雲年原本在藤田組的角色是扮演日本管理階層和臺灣勞工階層之間的橋樑，擔任瑞芳警察局的「巡查補」和守備隊翻譯。

在業界方面，從大資本的煤礦公司兼併

中小資本煤礦廠的過程中，亦可以看到顏家所扮演的橋樑角色。例如：「基隆炭礦株式會社」在 1919 年 7 月經顏國年「當事務之衝」，合併「木村礦業株式會社」；8 月收買芳川寬治所經營的「臺灣炭礦株式會社」，實現了三井財閥多年來欲統一臺灣煤業界的計畫，國年所扮演的中介角色日益重要。

三、顏家對文化教育的重視

顏雲年、國年兩兄弟先後於 1921 年 6 月和 1927 年 9 月被選為臺灣總督府評議會會員。

（一）文教建設的見解

顏家非常重視學術文化教育，雲年曾促成瑞芳公學校之開設，增築基隆公學校之校舍，並在 1921 年所舉行的評議員會中提出他對義務教育的看法。顏國年在第八次評議員會（1935 年 6 月）中再度強調對臺灣人實施義務教育的重要性。此種「臺灣應與日本本土平等」，而非殖民地的看法一直深入其心。除了初級教育外，顏國年主張在各州設一中級工業學校，南北部則各設一高級工業學校。

（二）對子女教育的重視

顏家對教育的重視可以從國年的行動中看出端倪。由於 20 世紀初期殖民地的臺灣



顏雲年全家



顏國年全家攝於陋園

欠缺高等教育機構，所以雲年不僅將3位兒子送往日本京都立命館大學就讀，並讓女兒進入京都同志社大學。國年的10位子女亦分別在日本和臺灣接受大學教育：長男為日本慶應大學經濟系，次男、三男各畢業於臺北帝國大學地質和農化系，四男就讀東京帝國大學法科，五、六男則皆受教於日本明治大學。

最值得稱道的是在重男輕女的傳統東亞社會中，顏國年卻對子女的教育一視同仁，長女顏梅就是最明顯的例子。長女畢業於現在的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學，次女和三女就讀東京的日本女子大學，四女在臺北的女子高等學院（後改名臺北女子專科學校）。但相對於顏梅的自小留學日本，次女顏碧霞則在基隆高等女子學校讀了四年，畢業後才到日本女子大學文科深造。同時顏國年亦重視子媳和女婿的教育背景，長媳婦畢業於日本女子大學，二、三媳婦分別受教於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學的理科和保育科，四男、六男未婚過世，五媳婦則是當時的基隆高等女子學校畢業；大女婿丁瑞鈺畢業於現今的一橋大學，二女婿魏火曜是東京帝國大學醫科畢業，三女婿劉青和為柏林大學化學博士，四女婿陳炳華是東京醫科大學畢業的醫生。

四、顏家的婚姻安排

周碧（自姻親而事業夥伴）在顏家姻親中，與顏家關係最深切、最長久。其他如丁瑞鈺、藍高川、許丙，以及謝汝銓、魏清德、李德和和張錦燦等姻親（由於顏雲年和國年都擁有深厚的漢文素養，又愛好詩文，所以在當時文壇亦負盛名，也與詩友結成姻親關係）在顏家的發展歷史中都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五、顏家女子的家庭觀

在教育並不普及的日治時期，顏雲年和國年的女兒可以說都得天獨厚，能夠接受到當時最高等級的教育，她們也都經過父叔的安排而結婚，婚後都專心於家務與子女教育，間或有長期從事社會義工者，但並沒有擔任專職。

以長女顏梅為例，她是日治時期第一位擁有高等學校教師資格（學成後受聘於基隆中學校）的臺灣女性，但仍毅然辭去教職，以家庭為重，不但身體力行，且在《臺灣新民報》上就改善生活問題，以日文發表〈家庭生活要以小孩為中心〉的文章：

關於臺灣的生活改善問題，最根本的必須改善之處就是從大家族制度的生活中解放出來，而過小家庭的生活。但是我認為這是時勢潮流所趨，（大家族）自然會崩壞，並不需要特別去極力呼籲小家庭的分立，時間將在最近的將來就會解決。此外，雖然尚有許多必須改善之處，可是我認為其中最重要的是要過專以小孩子為中心的家庭生活。往昔的家庭生活動輒容易流於大人本位而犧牲小孩，今後理想的家庭生活應以小孩為中心……盡量使大人的生活去接近小孩的生活，這樣才可以真正投射父母的感化……唯有自己去參與小孩的生活，才能真正了解小孩，才是真正的

愛。（〈家庭生活は子供本位に致したい〉，《台灣新民報》，1933年11月26日。）

顏梅童年是在數十人所組成的大家族生活中度過，家中墨守男尊女卑的舊習。她7歲時全家搬到基隆，仍然與雲年一家住在一起。後來，12歲的她在雲年的安排下，與雲年的幼女一起到東京留學（當時雲年的次男、三男皆從小學一年級開始在東京受教育，而基隆公學校畢業的長男也進入東京的中學），一起居住在雲年購置於東京的邸第。

在留學期間，她與父親國年書信往來頻繁（作者感謝其愛女丁玲兒教授的提供資料），即使國年到歐美考察期間亦然。國年屢屢在信中提及其弟妹的就學狀況。她學成後則由國年安排婚姻。或許長年與父母分隔重洋的寂寞心情（尤其是母親，因為國年常常因公務到東京，可以見面；而母親則留守基隆），讓她因此會感到家庭生活應該以小孩為重心，而父母（尤其是母親）應伴隨著子女的成長，並分享其喜怒哀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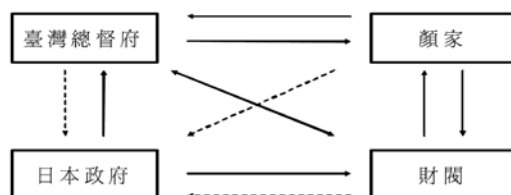
再者，時代環境也促使她加強兒女的家庭教育。當時臺灣當局開始皇民化運動，允許臺灣人可以進入日本兒童和青少年念的幼稚園、小學和中學就讀。原本臺灣人與日本人是不可共學的，於是如今一旦臺灣小孩想轉學到日本人念的學校時，校方會參考當事人的日語理解力和家庭環境，並加以考

試。因此顏梅為其子女的未來著想，在家中極力去設法提高他們的日語能力與其他科目的成績，使其子女不但能夠和日本小孩同窗共學，更期待他們能夠超越日本學生。就某種意義而言，成為「教育媽媽」的顏梅表現出不輸給日本人的當時臺灣知識分子的自負與胸懷。

進而言之，誠如顏梅的妹妹碧霞所言：「我們那一代的婦女都是自己照顧小孩，以家庭為重，婦女外出工作的很少。有一段時間（按：這應該是婚前），我也想過要外出工作，但父親勸我留在家裡照顧弟弟」。當時的外在環境並不鼓勵婦女出外工作，尤其是已婚婦女。而即使婚前的顏碧霞擁有高學歷，國年仍然希望她留在家中照顧弟弟，我們似乎可以窺伺到國年雖然讓女兒接受高等教育，但仍持有男主外女主內的看法。

六、結論

日治時期顏家是致力於臺灣經濟現代化最力的家族之一，由對礦業（金和煤）所做的努力中，可以觀察出他們和日本財閥、臺灣總督府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憑藉東北亞區域產業網絡的建構，使家族在當時臺灣經濟與政治社會上居舉足輕重的地位。從顏家人士的行為言論中，可以了解到他們與其說關心「國家」（日本）的前途與發展，毋寧可以說其關懷的重心是臺灣本土，是自己家園鄉土的基礎建設。



如圖所示，顏家接受臺灣總督府和財閥的指示，而此指示大多來自日本政府；顏家亦有機會向總督府和財閥建言，此建言或許會傳達到日本政府，或許他們後來也直接與日本政界人士相交往而有向日本當局表示意見的管道。另一方面，臺灣總督府和日本財閥在對臺的政策和實際行動方面必定相輔相成。